



•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 •

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 信用问题分析

——基于“政治人”的视角

Analysis of Local Government Trustworthiness in
Transitional Period: Based on the Political-Man

周伟贤 /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信用问题分析/周伟贤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096-1139-5

I. ①转… II. ①周… III. ①地方政府—信用—研究—中国 IV. ①D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2394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张永美

责任编辑: 张永美

技术编辑: 黄 铄

责任校对: 陈 颖

720mm×1000mm/16

13.5 印张

220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书号: ISBN 978-7-5096-1139-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68022974 邮编: 100836

序一

伍世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一次性的竞争博弈无法产生信任，但市场上买者和卖者之间长期反复的竞争博弈则会产生信用，使交易成本降低，市场运转自如。所以，可以说，市场经济与信用相伴相随、相辅相成。正因如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推进信用体系的建设尤为重要。信用体系的建设既包括个人和企事业单位，也包括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权力机关的信用建设是整个信用体系建设的根本。民无信只是人不立，官无信则将国不立。周伟贤博士以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为分析背景，以地方政府的信用问题为分析视角，将地方政府的信用行为及其治理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这对于建立健全我国信用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也需具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科学精神。

考察分析地方政府的信用问题，首先涉及对政府官员的人性假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官员如同厂商、消费者一样，都是“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追求自利最大化。许多关于政府信用的已有研究也承袭了这一假设前提，未能摆脱“经济人”的窠臼。其实，“经济人”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归根结底可归结为利己和利他两类关系，其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人群均为少数，绝大多数人群则是利己和利他的混合体，在不同的场合条件下表现出人性的不同侧面，显现出人性的多样性。倘若说人们在经济领域、私权领域表现出更多的利己性；那么，在政治领域、公权领域，则会表现出更多的利他性。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在一个民主进步的社会里，只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者才能得到人们的拥戴，任何成员都不会容忍一个“经济人”来担当“父母



官”。所以用“经济人”假设来套设政府官员的行为，与其说是张冠李戴，不如说是无中生有。

那么，对政府官员应如何进行人性假设呢？周伟贤博士在“社会人”假设的前提下，将政府官员定位为“政治人”，即“社会人”进入公共领域之后，具有以追求政绩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人格特征。这一界定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不同，对政绩最大化的追求是官员的行为目标。当然，对于什么是政绩、如何创造政绩、怎样实现政绩最大化等，人们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解析，这正如人们对“利润”、“效用”的内涵及其实现可以有种种解释一样，但这并不能否认官员作为“政治人”的政绩偏好特征。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执政者持有不同的政绩观，才有可能导致不同的政府信用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较为普遍地看到：有的执政者以民众满意为政绩，而有的则以上级满意为政绩；有的着眼长远、造福一方，而有的则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有的执政者体恤民力、关注民生，而有的则竭泽而渔、搞“形象工程”。可见，“政治人”不同的政绩观，必然产生不同的政府信用结果，这就抓住了政府信用分析的“牛鼻子”。

依据上述“政治人”假设，周伟贤博士以政绩博弈分析为工具，进而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本地公众、地方政府相互之间三个层面，以及契约承诺、履约行为、履约绩效三个环节，较为系统全面地剖析了地方政府信用缺失的种种行为表现，认为我国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失信内源于地方“政治人”的政绩观偏差，外生于转轨时期欠科学的发展制度环境，表现于“政治人”在任期内对中央政府、本地公众及其他区域的“政治人”失信的博弈过程之中。在上述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引导“政治人”守信、以完善监督机制约束“政治人”守信、以加强自身建设推进“政治人”守信、以建立评价体系激励“政治人”守信等一系列治理对策建议。上述结论既是水到渠成而得，又有入木三分之感；所提建设既切中时弊，颇有针对性，又讲求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但本书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有待完善。如对“政治人”的政绩追求偏好之论证除了理论分析之外，还可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予以证实；在肯定“政治人”政绩追求目标的基础上，有必要进而展开对不同政绩观及其导致的不同政府信用行为的比较分析；地方政府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是否科学合理，还有待实践的测试和检验。

虽有上述不足，但综观全书，仍瑕不掩瑜。作为周伟贤博士的指导教师，我为他在政府信用分析领域所取得的初步创新成果感到欣慰的同时，更希望他在这一领域继续跋涉求索，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思想成果，努力形成一家之论。

是为序。

序二

罗雄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历了 30 余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为基本点的快速发展。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趋强盛，整个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两极化且相对固化，社会成员跨阶层流动的门槛日益抬高，各种社会阶层及利益主体逐步呈现多元化之势。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又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的、短期难以逆转的变化。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经过“以改革求发展（1979~1990 年）”和“大开放、大增长（1991~2008 年）”两个阶段之后，已经正式跨入一个新的综合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将再次由改革来充当。当前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推进财税体制转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顺城市化进程，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消除国有垄断的弊病、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培育农地市场、促进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创新教育体制等。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我国已经跨入一个 2000 多年来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型时期，而各方面的改革又直接或间接地牵动着最为敏感的政治改革神经。鉴于此，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特区成立 30 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可以预见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将不可避免要发生。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政府，也已经开始某些政治改革尝试，如重庆在南川区实施以分权为特色的新政，江西省则在一些地区试行乡镇领导的公推直选等。在此大背景下，周伟贤博士从上述时代潮流和实践的要求出发，选定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信用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这是一个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选题。

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诺思，还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他们及其追随者大致都把政治家和公务人员当成理性经济人。这种基于新古典经



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尽管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能够提供一定的解释力，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最重要的一个缺陷便是：它把人的自利动机与自利行为简单地画上等号。事实上，依照马斯洛关于心理需求的层次理论，我们可以把他所列举的心理需求层次归纳为三个层次，即“基本的生存保障”、“享受”、“情感需要与自我实现”。随着历史的发展，一定社会的主导性需求不断由低级层次向高级层次递进，而在任何特定的社会里，除了主导性需求外，其他需求也会作为非主导的或少数人的追求同时存在。在人们处于基本生存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阶段，其自利动机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利他行为来实现，因为生存水平越低，人们越是要作为群体的分子来行动，个人利益总是要服从集体利益。当生存水平与其他动物接近或面临绝种威胁时，人的行为也就和所有动物一样，只能通过无私的牺牲精神来维持种群的延续，例如所有动物母亲都会尽照顾自己幼子的义务，这仅仅是一种不图任何回报的天性。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以至于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情感和自我实现将成为全社会的主导性需求。然而，情感不能像物质财富那样被单方面占有，只有关爱别人、自我付出，才能占有别人的情感。在这样的社会，自我实现不是通过对别人的直接的单向的支配来实现，通过对物的支配来间接支配别人也是行不通的。因此，要实现自我就必须首先向社会自我贡献，只有这样才能被社会认可和尊重，从而使别人自愿服从。因此，这种自我实现与情感的获得是联系在一起的。上述情况是利他行为成为主导性社会行为的理论上的典型，在这两种典型之间，是一个广阔的灰色地带，往往是利他行为与自利行为错杂其间。

社会心理需求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自利动机与自利行为的统一，仅仅是典型的、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的理论抽象，是人类特定阶段、特定制度安排下的行为取向。进一步说，即便是市场交易行为，也不能完全按“经济人”来理解。“经济人”既不能完全理性，也没有完全的意志力。并且，处于市场制度中的“经济人”要实现自利的目标，大多数情况是以相互合作、相互信任为基础，或者说，个人利益的实现必须运用“利他”的策略。另外，“经济人”主体也具有不同层次，“自利”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家庭、国家。当个人把家庭作为自利主体时，他对家庭成员往往采取利他行为；当个人把国家作为自利的主体时，他为了国家可能自我牺牲，可见“经济人”的行为取向还取决于他对自利主体的认识。总之，这种把自利动机与自利行为简单对应的“经济人”假设，不仅是从抽象的人



性出发，甚至是一种超人性的没有血肉、没有人身“市场理性”假设。其实质是把市场化的生产、交易永恒化、理想化。它完全脱离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定的制度环境，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行为的理论反映。这样一种“经济人”假设，即便是用于分析纯粹的市场关系，也还存在诸多的缺陷。因此，把这种“经济人”假设简单套用到公共政策方面，将政治行为看成一种市场交易，尽管也能提供有借鉴意义的一孔之见，其局限是不言自明的。

基于上述认识，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经济人”假设，周伟贤博士并没有抱有一种盲目崇信的态度，而是以一种求实的精神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和反思，并联系人的社会性，大胆地提出了作为新分析范式前提的“政治人”假设。这里的“政治人”，既是“自然人”，又是“公共人”，具有双重的社会角色。周伟贤博士认为，追求政绩是“政治人”最重要的行为偏好，并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明了的“政治人”收益函数。周伟贤博士还把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基于契约关系和信用制度约束，对“政治人”与公共权力委托人的政绩博弈中出现的信用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这一理论支点上，周伟贤博士围绕“政治人”的政绩博弈这一政府信用的核心内容，就我国转轨时期地方政府对中央的失信问题、对本地公众的失信问题以及各地方政府相互失信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并设计了一套中国地方政府的信用评价体系。

周伟贤博士这部著作，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政治人”假设，这使其关于地方政府信用问题的研究能够超越前人。单就“政治人”这一理论问题而言，似乎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余地，例如“政治人”如何对历史负责的问题——当领袖号召大炼钢铁，而全体人民又热情高涨的时刻，“政治人”如何权衡自己的言行？应如何用政绩博弈模型来分析那些对此大胆质疑的“政治人”的行为？又如在威权政治背景下，模型如何才能适用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人”？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阐述。不过，就本书的行为主体——中国地方政府而言，既有的“政治人”论证已经足够，完全能够对全书起理论支点作用。书中关于地方政府失信的种种现象及其原因的分析，大多切中时弊，对我国当前反腐倡廉、遏制腐败有较为深刻的警示意义；关于地方政府失信机理的探讨，有助于决策部门把握这一问题的发生、发展，为预防、消弭这一问题提供了分析手段；书中提出的对策建议



具有针对性和一定的可操作性，有利于我国政治体制的完善、改良。

从政府信用的性质来看，它更多地属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依照系统论，政治、经济、文化可看做是“社会”这一大系统中相互平行的子系统；从社会有机结构分析来看，经济和政治属于不同的结构层面。当然经济和政治总是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包含政府信用问题在内的政治体制及运行机制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作用机理。例如对于民主制度，一些人习惯于从一种价值观出发，运用人的“平等”权力来宣扬其优越性。其实这是一种肤浅的理解。民主制度的实质，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和平博弈机制，同时又是政府的“中庸”决策机制，也可以看做是社会不满情绪的发泄机制。当一个社会的利益主体多元化，以致各利益集团争相影响、操控公共政策的时候，公共权力必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这时，由于许多商业集团比某些公务人员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软权力，权力往往被要挟，掌权者行使权力的痛苦会不断增长，由于各方面的要求难以摆平，权力便会成为烫手的山芋。当权力垄断的痛苦和政治交易成本足够大的时候，民主也就成为各利益方的共同要求。对于这样一些政治问题，经济学工具是很难做出完美的解释。因此，作为政治学研究内容之一的政府信用问题，只有放到政治这一系统之中，将其与公共权力的授权、运用、监督等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得到更深刻、全面的说明。就此而言，周伟贤博士基于“政治人”假设研究政府信用问题，较之“经济人”假设已向研究主题大大切近了一步。但这种研究毕竟还是经济学角度的研究，由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存在难以对应的一面，这一研究成果也必然存在自身的局限，而这一切还有待于周伟贤博士及有志于研究政府信用的学者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前 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信用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诸多发展中国家相似,我国转轨时期的政府失信现象凸显,不仅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也导致政府信用水平不断下降。因此开展政府信用研究、提供信用建设的对策建议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尽管中外学者已从不同的视角对政府信用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不少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不足,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利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信用展开研究。由于“经济人”假设本身就存在问题,而且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及其行为与单纯的经济行为有很大区别,因此将原本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人”分析范式简单地推广、延伸并套用到政治领域的“人”的分析中来,是无法对政府信用的行为主体以及政府失信的原因作出科学解释的。

针对上述不足,本书提出了新的理论假设,并以此假设对政府信用进行重新解释,从而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府信用理论分析框架。其核心内容是:

(1)现实中的“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尽管追求利益是“社会人”的天性,但在社会中由于条件的约束,绝大多数的“社会人”只有采用利他合作的方式才能彼此信任而持续稳定地获得有限的利益。

(2)“政治人”假设。“政治人”是公共部门的从业者,是“社会人”进入公共领域之后所体现出来的人格特征。由于公共部门是为公共权力委托人创造利益的组织,因此尽管“政治人”也有着追求利益的本性,但其只有在得到公共权力委托人的信任并按契约规则为其创造政绩、实现利益的前提下,才能由此得到自身收益。因此政绩是“政治人”获得利益的基础,追求政绩是“政治人”最为重要的行为偏好。



(3) 由(1)和(2),可得到本书的核心观点:政府信用的本质是具有政绩偏好的“政治人”在任期内对公共权力委托人所作出的契约承诺、履行契约的行为过程及其履约结果;“政治人”与公共权力委托人之间的政绩博弈构成了政府信用的核心内容。

在完成了理论框架的构建后,本书以之为理论基础,对我国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信用问题展开分析,包括以下三大方面:

(1) 地方“政治人”对中央政府失信的经济学分析。由于体制转轨使地方与中央的信用博弈显性化,政绩博弈是地方“政治人”与中央政府信用博弈的核心内容,因此“政治人”的政绩偏好是其失信于中央的行为动机。现行的“GDP主导型”政绩考核制度不合理导致“政治人”失信行为的普遍化,不合理的监督制度使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陷入低效状态,在客观上助长了“政治人”失信行为的发生。在分析了地方“政治人”的失信动机和失信的制度环境后,本书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以政绩造假为例,揭示了地方“政治人”对中央失信的整个博弈过程。

(2) 地方“政治人”对本地公众失信的经济学分析。转轨时期的地方“政治人”失信于民内源于“政治人”的政绩偏好,外生于基于任命制的地方官员产生方式、不断变化的财政体制和以经济指标为主导的官员考核选拔方法。在分析了地方“政治人”失信于民的行为动机和制度环境的基础上,本书以招商引资为例,建立了一个地方“政治人”优惠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模型,以此解释地方政府失信于民的发生机理。

(3) 地方“政治人”相互失信的经济学分析。转轨时期各地“政治人”之间存在着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激烈竞争,“政治人”所具有的政绩偏好以及“政治人”之间基于晋升竞争的“政治锦标赛”导致他们形成相互不信任、不合作的状态,从而造成相互失信的局面。本书以地方保护为例对“政治人”相互失信的过程进行了博弈分析,结果表明,市场保护是“政治人”双方博弈的一个稳态均衡解,也就是双方在互不信任的基础上采取互不合作的策略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从而为自己实现更多的收益提供了可能。

根据上述分析,本书的结论是:我国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失信内源于地方“政治人”的政绩偏好,外生于转轨时期不完善的制度环境,表现于“政治人”在任期内对中央政府、本地公众以及其他区域的“政治人”失信的博弈过程之中。根据这些结论,本书提出了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信用

治理的对策建议，认为要做到有效抑制转轨时期的地方“政治人”失信，提升地方政府的信用水平，就必须：

（1）以制度化、具体化的科学发展观、政绩观引导“政治人”改变行为偏好，使之成为“政治人”在履行公共契约过程中的行为规范与制度约束；

（2）强化地方政府的失信约束机制，提升“政治人”的失信成本，以系统化的制度体系有效降低“政治人”的失信概率；

（3）开展地方政府自身的信用治理，打造阳光政府、绩效政府、责任政府和廉洁政府；

（4）以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客观反映地方政府信用，以此作为促进公共权力委托人和“政治人”双方共同提升地方政府信用水平的有力工具。基于此思路，本书设计了中国地方政府信用评价体系。

目 录

第1章 导 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的意义	9
1.3 本书的研究内容	10
1.4 本书的研究方法	14
1.5 本书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14
第2章 文献综述	17
2.1 关于信用、信任以及政府信用	17
2.2 关于政府信用的研究视角	26
2.3 政府信用缺失的危害及其产生的原因	33
2.4 关于政府信用建设的思考	39
2.5 关于政府信用评价方法的研究	41
第3章 政府信用的理论解释：基于“政治人”的视角	45
3.1 “经济人”假设和公共选择理论：相关的评述	45
3.2 “政治人”假设：理论支点的建立	51
3.3 政府信用的理论解释：基于“政治人”的视角	65
3.4 本章小结	76
第4章 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失信	79
4.1 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信用关系	79
4.2 转轨时期地方政府失信的主要对象	82



4.3	转轨时期地方政府失信的主要内容	84	
4.4	我国转轨时期地方政府失信程度的实证分析	92	
4.5	转轨时期地方政府失信的主、客观因素与危害	100	
4.6	本章小结	104	
第5章 地方政府失信的经济学分析 I：“政治人”			
	对中央政府失信	107	
5.1	地方“政治人”对中央政府失信的主要表现	107	
5.2	“政治人”对中央政府失信：动机的产生	108	
5.3	地方“政治人”对中央政府失信的制度环境分析	111	
5.4	地方“政治人”对中央政府失信的博弈分析	119	
5.5	本章小结	128	
第6章 地方政府失信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II：“政治人”失信于民			131
6.1	“政治人”失信于民的原因分析	131	
6.2	“政治人”失信于民的发生机理：以招商引资为例	134	
6.3	本章小结	140	
第7章 地方政府失信的经济学分析 III：“政治人”相互失信			143
7.1	“政治人”相互失信的主要因素	143	
7.2	“政治人”相互失信的形成机理	145	
7.3	本章小结	155	
第8章 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信用治理			157
8.1	以制度化的科学发展观、政绩观促进“政治人”守信	157	
8.2	强化地方政府失信约束机制，有效降低“政治人”失信概率	158	
8.3	开展地方政府自身的信用治理，打造诚信政府	165	
8.4	建立科学评价机制，客观反映地方政府信用	169	
参考文献			179
致谢			199

第1章 导论

政府信用不仅是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同时也是推动政府改革、提升政府效率的直接动力。研究表明，政府信用不但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还能提高政府的司法效率、降低腐败，是决定一个复杂系统效率的关键性因素（Seabright, 1992；福山，1995）。政府信用还是国家信用水平和信用能力的直接体现——政府信用度越高，其国家信用水平越高，这也就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支持。^①此外，政府信用也是建设诚信社会、创造良好社会信用环境的基础。“民以吏为师”，政府的行为是公众行为的表率，因此政府自身的行为必须恪守信用准则，在建立诚信社会的进程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有效的信用秩序（何显明，2004；周伟贤，2005）。

1.1 研究背景

1.1.1 政府失信已成为一个全球化问题

尽管政府信用是政府存在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

^① 国家信用或称为财政信用，是以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主体，以本国（地区）财政能力为担保，按照商业信用原则筹集和运用国际和国内信贷资金的一种金融形式。由于政府信用被看成是政府履行契约的能力，那么从金融学的角度来看，政府的信用水平反映了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或地区所具备的偿债能力，从而也就决定了其金融信用的水平。



素，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政府失信现象严重，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政府信用也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在西方发达国家，许多研究和调查结果表明，相当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公民对政府和高层行政机构“完全不信任”或“不太信任”。如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公众对政府及政府领导人的信任程度急剧下降，1998 年仅有 34% 的美国人可以信任政府，而 32 年前则高达 61%（叶初升、孙永平，2005）；1964 年，有 3/4 的美国公众认为联邦政府大部分时间可以做正确的事情，但到了 1997 年，只剩下 1/4 的公众相信这一点（Harris Poll, 1996；Hart-Teeter Poll, 1997）。美国 NES 发起的自 1964 年以来的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程度趋势的调查结果表明，其对政府的信任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后才略有回升，如图 1-1 所示。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于 1993 年指出，“未来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能够削减（财政）赤字，但不仅仅是削减开支，还包括一个信任赤字问题……政府中的信任正在衰落”（Gore,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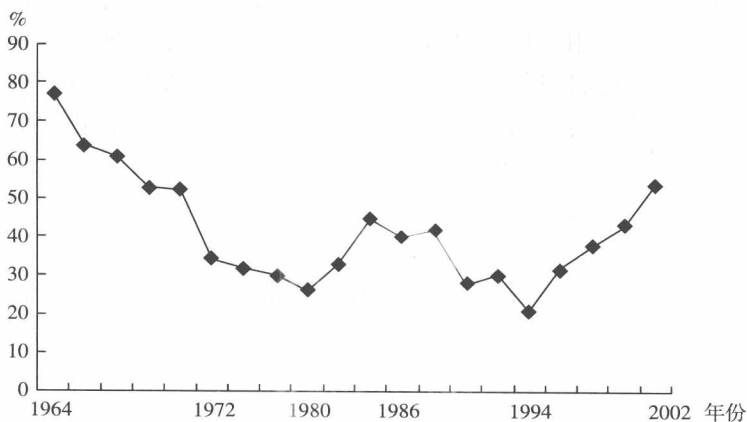


图 1-1 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程度 (1964-2002 年)^①

另由美国 Council for Excellence in Government 所做的民意调查则显示，1995 年美国民众对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仅分别为 15%、23% 与 31%（Council for Excellence in Government, 1995）；另一份民调（NPR/

^① 资料来源：Sapiro, Rosenstone, and the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2004)。